

一张照片

杨悦

我在一本由越南带来的《唐诗三百首》的夹页中，发现一张照片，照片背面注明“摄于1952年”。1952年，离现在已超过半个世纪了，相片已发黄，但我仍清晰记得，那是在打石街（后来改名梁如学街）杜惠霞家天台上的同学聚会，也是我就读知用第一次参加同学们的聚餐会。照片中的同班同学，我都能认得出，像杜惠英、杜式文、蔡德寅、冯爾富、杨许发、李伟贤、刘志安、尤惠娥、吴银珠等等、等等啦，我还能连名带姓叫出他们的名字；高班的哥姐们有杜惠霞、杜式孝、李珊珊、黄和高、邓应雄、蔡敦正、郭进取等人，其他我不认识，共计大概有二十来三十人。

就是这张照片，勾引起我的许多记忆，令我回头遥望那流逝的岁月。当时的越南虽然战云密布，可是西贡堤岸偏安一隅，倒是歌舞昇平，尚未闻到硝烟味。相片中的我们，女生全是“椰壳发型”，男生也是头发剪得短短的，个个显得天真无邪，朝气蓬勃，满怀理想，透出几分英姿焕发，大家正处于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时期，而那时的我，还傻傻乎乎地以为山上真的住着个“神仙”，或是什么“救世主”呢！

离开知用后，由于局势动荡，男的要当兵，我们班同学不是回国升学就是到台湾念大学，不然就是到香港、柬埔寨、老挝等地避难；留在西堤而且能见上一面的已是屈指可数，不过，大家都非常在乎我们曾经拥有的这段“知用情”，偶尔路上相遇，仍旧真情流露，互问近况，互道珍重。

我已想不起是由哪一位的提议，也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留在越南的几位同班同学，订下了每月一次聚会的约定。总之，每次均由赵淑斌、苏耀香夫妇和杨许发分别开两部车子，载着我和蔡德寅、李友仁三对夫妇和吴银珠到守德、边和两地郊游，吃顿越南餐，有时我们还带着小孩同去。聚在一起，大家既大块朵颐，又能天南地北，畅所欲言，谈的不亦乐乎！

有一次，我们约了在边和空军基地工作的廖生华，他当时是空军上校，开着一部吉普车出来迎接我们，并带我们走马看花参观他的营地。记得当时有位女同学（姑隐其名）悄悄问我：“死了！我只记得他叫“大笨象”，他什么名呢？”这让我想起在我们班上，廖生华算是得人高马大的一个，比许多同学快高出一个头，他又寡言少语，所以才被想象力丰富的同学，给按上这个花名，想不到很快就在班里传开了。谁都知道花名最容易琅琅上口，难怪有不少同学记不起他的姓名。但毕竟带有个“笨”字，像“大笨牛”、“笨驴”、“笨猪”啦，都不是什么好名声，所以我们祇是背地里称呼他，可不敢当面叫他；不是怕他老羞成怒，一拳打过来，而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，总算是很厚道罢。其实，我觉得他这人蛮和气的，与同学相处，我从未见过他动过怒。再说，称他“大笨象”也的确委屈了他，如果脑筋不灵活，不眼明手快，又怎会驾着超音速战机在蓝天上呼啸而过呢？

大约是 1974 年年底吧，李树桓加入我们的聚会，他在台湾大学毕业，娶个台湾姑娘回来，他的七岁的男孩，天真活泼，很会讲话，蛮讨人喜欢！多年不见，李树桓仍旧保持沉默寡言的作风，不像我们一见面就嘻嘻哈哈的，高谈阔论。他的太太却跟他完全不一样，她能言善道，虽是同我们初次见面，老练的交际言辞，使她很快跟大家缩短距离，融成一片。

晴天霹雳！刚步入 1975 年没多久，一天早晨我拿起报纸，骤然看到李树桓在知用给枪杀的消息。于是，我们每月一聚的约定也随着李树桓的猝然逝世，“有”疾而终了。之后，除了杨许发，我跟其他同学也互不往来了。

1975 年 4 月初，南越政局急转直下，西贡已陷入兵临城下的困境。4 月 30 日，美国一手扶植的南越政权也因主子的丢弃而“檣櫓灰飞煙灭”。我们这些“王谢堂前燕”也就各自纷飞，从此断了音讯。还有，4 月 30 号那天，廖生华能否驾驶战机飞离越南，逃过那所谓“学习改造”的牢狱之灾？李树桓的夫人今何在？他的男孩应该成家生子生孙了吧？这些问题，我真想知道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飞逝，转眼间过了 30 多年，与我有交往的同学，除了部分已驾鹤西归，远离尘世、永居极乐世界外，所幸后来大多数都能联络上。我们常通电话，互传 Email，也在两次的广州知用校友联欢劫后重逢过。我记不起谁说过，“怀旧，是片片浪漫记忆的回味。”因此，夜间睡不着觉时，我常会一页一页地翻开心中的记忆，反复咀嚼着那一段与同学们相聚的欢愉和温馨往事。所以呀，往事并不如烟！

“明天会更好”，仅是个愿望，而“明天会更老”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！但愿普天下的知用同学千万要保重，明年 4 月 16 日，大家在澳洲悉尼的全球校友联欢会相见，细数那并不如烟的往事罢。

（2010 年圣诞前夕，矽谷）